

第一章

从清流党到洋务派

一 加入清流党及其地位和作用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负有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的称呼。晚清的“清流”又称清流党或清流派，它是同治、光绪年间继洋务派兴起后，统治集团中的又一个政治派别。晚清的“清流”还有前清流和后清流之分，是统治集团内、特别是军机处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

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死，其幼子载淳继位，由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訢于同年11月发动了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夺得了清朝统治的最高权力。为了应付风雨飘摇的局势，尚缺乏统治经验的叶赫那拉氏极

意依靠和笼络奕？，让奕？总揽朝廷内政外交大权。但是，当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后，权势欲极强的那拉氏便不能容忍声势显赫、大权在握的奕？了。为了垄断朝政，她突然下令罢黜奕？。由于群臣的反对，那拉氏后来虽然恢复了奕？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却从各方面对他掣肘、裁抑。1865年底，她把同治帝的师傅、内阁学士李鸿藻派入军机处，对奕？进行牵制。李鸿藻思想保守陈旧，反对一切改革，在政见上与奕？等洋务派严重对立。他仗着慈禧的支持，利用自己军机大臣的身份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进的御史、翰林、文人学士结纳在自己的周围。时人记载说：“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①清流派自视清高，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一般都大胆敢言。他们不断评议朝政，纠弹权贵，抨击奕？、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全国”^②，形成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慈禧为了扼制奕？和李鸿章等人势力的发展，需要在统治集团内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于是，她施展种种政治手腕，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权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捞取“清议”的拥戴和舆论的支持。自己则居高临下，随意操纵各派政治势力，巩固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张之洞之所以参加清流派，是由其教养和经历所决定的。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熏染。从小对功名怀有很强烈的追求。由于他聪明好学，所以13岁就成为秀才，16岁中头名举人，26岁中探花。此后，张之洞在京则官翰林，外放则点学政，过了近二十年的翰苑言官及学官的生活。这段经历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朝廷中那些“清流雅望”又没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

② 《清代轶闻·清流党之外交观》

有掌握实权的清流人物接触，促使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日益和清流派接近。1877年他从四川学政任满回京，再度充任教习庶吉士这个冷差。此时，适逢他的40岁生日，已是“不惑之年”的张之洞，面对的现状却是国势日衰，个人官运蹇滞，加上自己手头拮据，两袖清风，连做生日都是典当了妻子王氏的陪嫁首饰才置酒自祝。公私交迫，景况不佳，凡此种种，张之洞莫不感慨系之，心怀抑郁。恰在这时，京师清流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国子监司业宝廷、詹事府左庶士黄体芳等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他们尖锐地评议朝政，抨击时弊，引人注目。张之洞对他们的主张深感同调，于是参加了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他既同张佩纶订交“究心时政、不复措意考据之学”，^①以喜言国是、弹劾大僚为贵。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十数人“常于松筠庵为会，讨论朝政，一时殿陛风生”。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针砭时弊，不遗余力。加以他才华横溢，思虑周密，所上奏折都很有份量，不能不令人叹服。所以，张之洞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清流派的一员健将。他和张佩纶被时人称为“青牛角”（清流谐音），尤为李鸿藻所器重。于是，“二张（张之洞、张佩纶）一李（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思，广结党援。”^②张之洞以清高自诩，以匡济自负，和清流派人物一起活跃于朝野上下，他们“连成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③成为朝廷中颇有影响的政治集团。

张之洞的清议活动，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不仅对清廷的内政外交问题直抒己见，而且还提出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举其荦荦大端，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抨击吏治腐败，弹劾贪官污吏。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下同）卷1。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第32页。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第90页。

这主要表现在他为四川东乡(今宣汉县)诬民为逆案“平反昭雪;与陈宝琛联名上疏抗争“裁抑奄官”。四川东乡冤狱发生在光绪元年(1875年),东乡知县孙定扬勾结支应局劣绅对农民敲诈勒索,违例苛敛,农民不服,聚众闹粮。孙定扬恼羞成怒,居然诬民为逆,具稟请剿。当时署理四川总督文格不问青红皂白,饬批各营痛加剿灭。提督李有恒率兵到东乡,大举烧杀抢掠,“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女老幼而尽杀之。”^①事后,文格不察虚实,不论案情,有意包庇肇事凶手孙定场、李有恒,反而诬告东乡农民“叛逆”,构成冤狱。1876年,东乡农民代表袁庭蛟赴京控告,反被刑部拘押,后解回四川。都察院御史看出蹊跷,纠弹文格等人。清流派配合御史的纠弹,奔走呼号,为无辜受害者伸冤,结果是“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②首恶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含冤九泉。

张之洞在光绪二年(1876年)视学四川期间,对此案已有所闻。当时,他对“川省赋敛之太重,民力之困竭,诬叛之奇冤”就深表同情和愤慨。张之洞痛感有责任把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惩恶扬善,辨诬申冤,为东乡农民平反。于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乘朝廷改派的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赴州查办覆命之机,以《重案定拟未协》专折上疏,指出“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接着,他详细列举了四川官吏横征暴敛,鱼肉乡民的情况,指出川省杂派最多,苛敛不已,钱粮之外加津贴,津贴之外又加捐输,捐输之外再加各种杂派,层层加码,名目繁多,“皆取之于民,皆派之于粮,局绅议之,官吏敛之。”农民的实际负担,大县增加十倍,中县增加五六倍,民力已竭,仍不敢怨,因为“粮民交纳者,先完杂费,继完津捐,然后许完正赋,杂费不完,串票不可得,无串票

《张文襄公全集》1928年版(以下同)卷1第17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1第12页。

则官得治以抗粮之罪，其术亦巧而毒矣。’^① 为农民伸张正义，打抱不平。

张之洞还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财力兵力权谋术数皆不足恃，惟民心可恃。要赢得民心，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可是，东乡县知县孙定扬病国以谋身家，剥民以饱私囊，“自同治八年（1869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干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他列举祸首罪状：“今孙定扬横征暴敛，妄召外兵，残民以逞，民不叛而诬为叛，城不围而捏为围，兵已临而不乘机抚定，将欲剿而无一语阻拦，流毒半年，杀人如麻，假使非该员捏禀于先，则督臣剿洗之批从何而下，非该员怂恿于后，则各营搜杀之念何自而萌。”^② 最后，张之洞强烈要求平反冤案，严惩罪魁，杀孙定扬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张之洞的专折有理有据，痛快淋漓地把东乡农民冤案的真像揭开，引起部分朝臣的共鸣和支持。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诏令刑部议奏平反。肇事主犯孙定扬、李有恒等被判处死刑，文格被革职查办，恩承、童华亦因复查不实，欺上瞒下被充军。蒙冤多年的东乡农民终于得到昭雪，张之洞“清议”显示了作用。他由此名声鹊起，赢得了“直谏”的美誉。

光绪六年（1880年），张之洞和另一清流健将陈宝琛抗疏李三顺案，再一次显示了清议的一定作用。李三顺为慈禧的侍奄，一次奉命往醇王府送礼品，因违例直出午门，被值班护军阻挡，双方发生口角。李三顺狗仗人势，盛气凌人，护军亦是满洲贵族，一气之下就揍了李三顺一顿。李三顺向慈禧诬告禁御藐抗懿旨。慈禧大

《张文襄公全集》卷1第1—3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1第7—12页。

怒，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杀死护军。奕訢、李鸿藻等虽持异议，但又怕得罪慈禧，故不敢公开表态。这么一件小事，一时竟造成“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的局面。张之洞和张佩纶、陈宝琛等频频密商，决定根据张之洞的意见草拟奏折，由他和陈宝琛二人联名上疏抗争，指斥李三顺违反宫廷禁例，咎由自取，认为惩罚护军既违祖训，亦有悖情理，要求宽免护军裁抑奄宦。疏上，慈禧对清议有所顾虑，同时觉得为此杀掉几个满族护军也有点太过，遂改下懿旨，从轻发落护军，并将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

2. 关心百姓疾苦，敦请朝廷救患兴利，采取措施解除民困。

考察张之洞这个时期的言论、行状，可以看到他对于贪官污吏横行不法，侵害百姓，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安、清王朝统治不稳的行为深表不满。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有时也能为民请命，要求统治阶级关心民瘼，重视农桑，兴修水利，救灾救荒，减轻人民的痛苦。

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陕西、河南、直隶等省虫灾旱灾持续了好几年，而且日益严重，百姓困苦不堪，“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张之洞连连上疏言事，敦请朝廷“速筹荒政”，关心民间疾苦。他说“北方苦旱既已连年，今岁偏灾不止十省，以后天时人事，正未可知，奇荒不可预料”，^①要求朝廷严饬各地督臣，凡拯救灾黎的一切抚恤事宜都要急为筹划，万不可缓。“其不尽心荒政之官吏，严加参劾”，激切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能够减少灾区人民的苦难，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张之洞提出几条救灾办法：一曰借款平糶，一曰分地劝贷，一曰井工代赈。救荒备荒兼而顾之。

张之洞认为，要解决燃眉之急，解民于倒悬，为今之计唯有国

^①《张文襄公全集》卷1第27—29页。

家出钱，官买官运，大举储粮平糶。因为灾荒以来，奸商乘机囤积居奇，粮价暴涨，灾民叫苦不迭。若不迅速设法，“饥寒交迫，难保无匪徒窃发煽惑滋事”。他建议朝廷下旨命令“直隶督臣李鸿章于天津库款无论何项经费借拨银二三十万，再借洋款数十万，共凑百万派员分领，南赴上海收买洋米，北赴牛庄收买奉天杂粮，兼于东昌收买山东杂粮”，然后火速由滦河入口运津，在天津设立平糶总局；所购之粮，随到随运，北发京师，南发晋豫，查照市价，减值平糶。^①有人担心这样做，国家亏损过大，而且“晋豫受其福，而近畿转受其累”。张之洞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纵使国家“略有耗减，终是润及于民”。灾情如此严重，黎民如此困苦，救灾纾难当为天下第一大义。所以，“此时无待探求，总之为北数省增无数之粮，自然暗裕数百万饥民之食，赢亦利，亏亦利，事理昭然。”

张之洞考虑到消极救荒终究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主张积极备荒。他提出“井工代赈”的办法，认为北方宜兴修水利，才能根治旱灾，因地制宜，唯有挖井吸水，溉灌农田一法，在直晋豫等地可以推广施行。挖辘轳井一口可溉田十亩，水车井一口可溉田五十亩，这显然是备荒的善策。但挖井工本费较多，贫苦农民没有资金，只有劝导富户出资，贫民出力，广兴井工，大兴水利。这样，“今年固可养无数之穷民，来年即可得无数之沃壤，有雨则丰者益丰，遇旱则歉者不歉”。至于出资挖井的富户，由官府派员验收，查实钱数，比照捐办官工，给予优奖。张之洞提出的上述救灾措施，大部份奏准施行。虽然不能从全局上根除灾民的疾苦，却也能够局部上消除人们的少许苦难，在客观上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符合人民的利益。

3. 反抗侵略，保卫疆土，抨击洋务派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

^①《张文襄公全集》卷 1 第 31 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卷 1 第 32~33 页。

张之洞在中俄伊犁交涉中一再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主张拒约惩崇 抵抗沙俄侵略 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爱国热忱。

光绪五年(1879 年)十月,昏庸的崇厚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擅自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中国名义上收回伊犁一座孤城,但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还要赔款五百万卢布。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清政府碍于舆论的压力,拒绝承认和批准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赴俄重开谈判。

围绕《里瓦几亚条约》的准驳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鸿章为崇厚辩护,认为“其曲在我”明确主张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时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洞不畏权势,反对对俄妥协。他于同年十二月初五(1880 年 1 月 16 日)上《熟权俄约利害折》慷慨陈词 逐条分析《里瓦几亚条约》对中国的严重危害 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必改此议 不能无事 不改此议 不可为国”。要求朝廷立即将“误国媚敌”的崇厚“拿交刑部 明正典刑”,以为后来者戒。^① 他主张将沙俄的侵略行径和中国改议条约的缘故“布告中外”同时“急修武备”准备自卫战争 防御沙俄的侵略。最后 张之洞在奏疏中写道:“臣非敢迂论高谈 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不以今日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② 张之洞这份说理透彻的奏折,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和中下层官吏中广为传阅,影响甚大,对带动朝野反接受《里瓦几亚条约》起了一定的作用。

《张文襄公全集》卷 2 第 1~3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 2 第 5~6 页。

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清廷屈从于列强的压迫,主张宽免崇厚之罪,张之洞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在6月23日《敬陈经权二策折》中愤然写道:“自冬春以来,俄事初起,臣屡次上疏,大意不外修备筹防,以为操纵之地。悠悠数月,军容阒然。今者俄人恫吓,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入告,权臣不再计,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策。睹此时局,不胜愤惋!”^①为此,他指斥李鸿章、刘坤一拥兵畏战,泄泄沓沓,毫无切实战备措施的作为。指出“李鸿章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②抨击李、刘“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之计……何以为心,何以为颜”。^③建议“将南北大臣立加严谴,仍责令戴罪急修水陆防务”。刘坤一就因他参奏而丢官,一直赋闲九年。

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后,张之洞就反复上疏,提醒朝廷加强战备,并提出许多加强边防海防,抵御外侮的办法。他主张“备为主讲为辅”,“无备则不能战,无备则不能讲”。因为我多一分兵威,则敌人少一分要挟。否则,“俄人知我实,肆其恐吓”,虽有辩士将不得言,言亦不信”。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但由于他“人微言轻”,没被清政府及时采纳。为此,张之洞焦灼万状,忧心忡忡。1880年8月底,沙俄宣布拒绝与曾纪泽继续谈判,改派布策来华交涉。清政府大为恐慌,妥协派乘机力主早日言和。张之洞苦口危言,不厌其烦地敦请朝廷“宜审其缓急,权其轻重,勿再游移,勿再延缓,勿再惜饷,勿再吹毛求疵而弃将材,勿再听督抚推宕粉饰,勿再持邻国调护遂存侥幸,勿再听敌国甘言遂懈军心。俄人见我实有战心,庶可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2第20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2第4—5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2第23页。

早成和议”。^① 针对朝廷对布策来华的恐惧，他在 9 月 28 日的奏折中又指出：“布策此来，固是危局，亦未必非事机。……从古敌国交际之事，谋战为本，辩论为末，形势相禁制为上，婉词恳请为下。计其到来，尚须一月，即或决裂，又须兼旬，及此之时惟有急修武备，静以待之。”^② 倘若朝廷仍然仓皇失措，犹豫不决，既无斗志，又昧机宜，听命敌人，受制诸国，甘受俄人要挟，则非但谬约不能推翻，恐怕“不待数年一修约，十八条仍尽许之，再修约而十八条之外又加十八条矣”。^③ 表现出一片忧国衷肠和谋国苦心。

总之，围绕改订中俄条约问题，张之洞从光绪五年底到光绪六年共上疏十九次之多，竭力发挥他出色的清议才能。自然，张之洞的奏稿中有不少内容难免疏于书生策士之见，尤其是他对曾纪泽“但论界务，不争商务”的种种指责，更表现他空托大言，不谙外事，缺乏实际经验。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奏议也明确地体现了张之洞鲜明的爱国立场和抵御外侮的热忱，反映了他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力争民族权益的愿望。张之洞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对坚持改订条约的理由，对妥协派投降政策的揭露以及对抵抗外敌侵略的政策建议也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的言论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曾纪泽在彼得堡的外交斗争，对于推动清政府坚持改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经过伊犁事件这场政治风波，张之洞进一步博得朝野的好评，也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从此崭露头角，蜚声政坛。在光绪六年前后，被连年擢拔，光绪七年（1881 年）十一月，张之洞更由阁学外放山西巡抚，官阶由正六品升到从二品，由翰苑谏官变成了封疆大吏。真是官符似火，步步高升。随着地位的晋升，处境的变化，他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 3 第 8—9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 2 第 30 页。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 2 第 21 页。

也开始由清流派逐渐向洋务派转化了。

诚然，作为清流人物，张之洞确有不少可訾议之处。他太热衷于仕进，往往“以空言博取时名”。为了升官，他努力接近顽固派，追随权臣李鸿藻，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靠山，甘愿充当派系斗争的工具。1876年，军机大臣文祥去世，沈桂芬地位上升，李鸿藻不甘受制于人，决意排挤沈桂芬出军机。在李鸿藻的支持下，张之洞、张佩纶等一再攻击沈桂芬。张之洞说：“吴江（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万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①张佩纶则攻击说：“吴江势焰愈张，中国危端立至。”^②慈禧听信了他们的话，拟将沈桂芬外放为贵州巡抚，后来虽未成事实，却严重地动摇了沈桂芬在军机处的地位。沈桂芬是该指责的。但张之洞等人对他的抨击自然包括了派系倾轧的因素。时人指责张之洞“以谏书为捷径，鼓扇浮薄，渐成门户”。又说“张之洞金壬首祸，李鸿藻要结取名，遂使奸人小夫为捷径。”^③这样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张之洞为了开拓政海仕进之途，又十分注意处事的圆通，主张“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相忍为国”。^④这就说明他善于察言观色，极力迎合慈禧的需要，博取各方面的好感。如前所述，他坚持反对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要求杀崇厚以谢天下，并对李鸿章等妥协派作了无情的揭露。但当他看到朝廷决意宽免崇厚时，就主张“当病而止，而不为太过”，上疏建议让“崇厚戴罪自效”。曾被他屡加斥责的李鸿章，忽而又说成是“精力犹壮，倘专其责成，当可力图御侮”的“高勋重寄”之名臣了。为了获得朝廷的信任，他学会了一套

《李鸿藻先生年谱》第 313 页。

② 张佩纶：《涧于集》。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甲申二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

《张文襄公全集》卷 214 书札 1。

揣摩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意向，看慈禧眼色行事的本领。1879年，同治皇帝棺槨移葬陵墓，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谏争确定大统。上疏斥责慈禧不为载淳立嗣，是擅改祖制，贪握政权。慈禧大为震怒，下令立斩吴可读。但吴视死如归，自备棺材在宫门外等待处死。而素敢大言，熟知儒家精义和祖宗之法的张之洞明知慈禧理屈，对慈禧的决定没有抵制、反对。为此连张佩纶都讥讽他“主兼祧而又恐涉于趋时”。^①1880年，他与陈宝琛上疏抗争“裁抑奄宦”一案时，张之洞亦认为“惟均只可称引祖制，泛论裁抑宦寺，俾太后自悟，万勿直疏本题发挥，恐后激怒”。^②只敢顺着慈禧的意旨上疏言事，不敢稍有出格，多所拂逆。在他的奏疏里也不乏“媚事孝钦、称颂唯恐不美”^③的谀词。张之洞的这些弱点，都是不容忽视的。他的这种立身处事态度除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外，同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有关。倘若他自不量力，不基本顺着上面的意志行事，随时会有不测之祸。因此，张之洞在直言敢谏的同时，又往往在当时政治生活的某些环节上旁顾、趋时，说一些违心的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之洞这个时期围绕爱国忧民的问题不断地发表清议，但是，他的爱国忧民是在一种“忠君报国”的思想支配下所产生的结果。他自幼深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忠君、尊孔的思想甚为浓厚。后来，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又受到慈禧的青睐，官运亨通，平步青云，这使张之洞对清统治者充满了感激之情，时刻以“忠君爱国”为标榜，冠冕堂皇地表示“凡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④但是，他的所谓爱国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实质上，他思想上是把君和国看成一个东西的，忠君报

① 张佩纶：《涧于集》。

② 《国闻周报》第12卷第10期。

③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214书札1。

国就是忠君报君。因此，张之洞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清朝尽忠效命，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的。尽管如此，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他这个时期的表现给予足够的肯定。因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我们不能要求张之洞没有忠君思想，也不能苛求他摆脱地主阶级的立场。他为清王朝尽忠效命的主观动机从本质上说是不可取的，但究其客观效果，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考察张之洞的“清议”主张和活动，就其当时所起的主要作用来看，不能不说是一种于民有益、于国有功的思想言行。

张之洞从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中赢得了声誉，又在清流派瓦解之前脱颖而出，迈进封疆大吏的行列，而且能棋高一着，认清形势，迅速地摆脱封建顽固派的窠臼，成功地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变。不过，在他日后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却始终保持着清流特色。关心国家命运，“弹奏国家大政”维持天朝圣教的无限尊严，充当纲常名教的卫道者。另外，从忠君思想以及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愿望出发，他把做清流党时的爱国忧民思想贯彻于他的政治实践中，使他为官比较清廉，尚能励精图治。

以上，我们对张之洞的清议活动作了一番粗略的分析和评价。作为清流人物，他难免有很多不足，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卷进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充当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工具。但我们理应看到张之洞不避权奸，直言敢谏，大胆抨击时弊，纠弹失职官吏的可贵精神以及他那种为民请命，伸张正义，解除民困的急切心情，特别是在对待外国侵略这个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张之洞的态度也是坚决的，爱国的。因此，对于张之洞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随意拔高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同样，对他在某些方面所起到的进步作用视而不见，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 向洋务派转化

（一）抚晋——转化的起步

光绪七年十一月（1881年12月），清廷任命张之洞为山西巡抚后，他为自己终于跻身于封疆大吏的行列而无比兴奋，同僚好友也纷纷登门祝贺，迎送拜会，好不繁忙。而后又上殿辞行，聆听慈禧太后的训示。慈禧告勉说，当今时世艰难，应好好为国效力，如有所见，及时陈奏，并要留意访求人才。此后，张之洞便匆匆赴山西走马上任了。

张之洞到山西后，马上确定以安民求治、发展经济、练兵讲武作为治理山西的根本宗旨。他在《到山西任谢恩折》中说：“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时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①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立稳脚根，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统治的地盘；要巩固和扩大势力，就得发展经济、兴办实业，并要编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担任山西巡抚短短的二年多的时间内，苦心经营，办了一系列事情。

1. 政治方面，张之洞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劾罢害民不职之官，褒奖循良之吏，革禁陋规和裁减差徭。张之洞到任后，对吏治情况进行了明查暗访，强烈感到山西吏风不正，已积重难返，官吏大多不思振作、不思变革，庸惰懒散之风甚盛。他摸清了全省官吏政绩优劣情形后，参褒并举，整肃吏治。一方面参革贪纵害民、劣迹昭著的不职之官，如萨拉齐同知定福、候补直隶知州李春熙、补用知县洪贞颐、宁武知县萧树藩等九人，于光绪八年被参免。^②另一方

^①《张文襄公奏稿》1920年版（以下同）卷3第1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卷4奏议4，《特参害民不职各员》。

面，他又褒奖了颇能勤政爱民的太原府候补知府马丕瑶、候补直隶知州方龙光、朔州知州姚官澄、阳曲知县锡良等六名官员。^①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遵照慈禧太后让他“留心访求人才”的谕令向朝廷上了《胪举贤才折》在全国范围内荐举京官、外官文武共 59 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他的清流同僚，如张佩纶、陈宝琛、于荫霖、吴大澂等，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素无通识者”。^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到山西后，促成了寓居山西解州的原户部侍郎阎敬铭的复职。阎敬铭为官本较廉洁，但遭政敌构陷攻击，说他在山西趁荒年购地发财，以致称病隐居解州。张之洞查清此事无实据后，一面连连上奏清廷，荐举阎敬铭复职；一面派知府马丕瑶持手书敦促其出山。在张之洞的力荐下，清廷任命阎敬铭为户部尚书。他到任后，大力整顿清朝财政，查禁贪污受贿，打击惩治了一批赃官，还大胆查处了署理户部尚书王文韶等二十余人伙同贪污云南军费 20 余万两白银的大案，在一定程度上整肃了清廷的财经纪律。

为实现“养廉课吏”，张之洞将原定省府署每年 19550 两的办公费用，除支付桌饭银等 6400 两之外，其他陋规全行裁禁。全省各衙门的公费，也依光绪六年原定数目，酌情分别裁汰；并严禁下级官员向上级“馈送水礼”等。此外，张之洞还派得力人员下至各州县，去裁减实际上按钱摊派的“徭役”和车马之税。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山西吏治腐败的面貌。

2. 经济方面 张之洞实行了垦荒积谷、清丈地亩、清查库款、整顿盐务、禁种罂粟、倡办洋务等措施。张之洞在 1882 年 7 月上呈的《整饬治理折》中提出了治理山西的要务六项二十条，其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就占四项十五条，足见他对整饬经济的重视。他的奏折得到清廷批准后，即开始次第实行。

《张文襄公全集》卷 4 奏议 4，《褒奖循良片》。

《张文襄公全集》卷 4 奏议 4，《胪举贤才折》。

首先，张之洞针对当时山西有无主荒地一万多顷，并有大量流亡饥民的现实状况，令各属劝百姓垦荒，规定凡新开垦之荒地，三年内不起征，实力垦荒者可酌给耕牛、种子。他还令各府、州、县建仓积谷，以备赈济灾民和打击奸商囤积居奇。

其次，张之洞针对山西向来没有为征派赋役而用的“鱼鳞册”，土地税征收十分混乱的情况，决心查清土地状况，确定征税范围，令各州县清丈地亩，造册铃印，重造“鱼鳞册”。清丈六年，暂免一年征税。通过清丈核实后，减轻了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百姓的负担。

第三，张之洞发现，山西的财政开支十分混乱，竟有三十余年未曾清查，已成一笔糊涂账，亟需进行整顿。为此，他抽调府州官员马丕瑶、李秉衡、俞廉三等人，配合布政使、按察使，成立了山西清源局，刊刻关防一颗，制订章程 21 条，分门别类清核库款。^①至 1883 年底，清核库款工作完成，查出实在存银 72 万余两，初步整顿了山西的财政。

第四，山西解州是我国池盐主要产区之一。盐政关系国计民生，清末山西盐务弊端丛生，主要是陋规贪索和走私漏税多。为革除陋规，他制订章程 13 条，饬令官差除收厘税外，不得违例浮收；也严禁商人短斤缺两、乱加价。为杜绝走私，他饬令盐官在私盐入境之途，设置关卡查禁。经整顿，基本革除了多年来的盐务积弊。

第五，山西是种植罂粟、吸食鸦片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城乡士农工商，遍吸鸦片。张之洞到晋后不久，就发出过“晋省患不在灾而在烟”的慨叹。^②于是决心禁种罂粟、消除烟患。他制订了禁种罂粟章程十条，严饬各属，发现种植罂粟者，当即拔毁，并对种者施以刑罚，再种则田亩充公，严惩收罂粟亩税之官吏。同时设立戒烟局，一面查禁烟馆，一面令吸食者限期戒断，许其自新。官吏吸食

①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牍稿》1920 年版，下同，卷 1，《札司道设局清查库款》。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 214 卷，书札 1《与张幼樵》。

者，分别撤任停委，兵勇吸食者，则裁汰不用。对查禁得力之官员，给予记功请赏，查禁不力者，则摘去顶戴或开缺革职。经过一番严禁，种植罂粟最盛的交城、化州基本禁绝，其余各州县也十去七八，烟毒泛滥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抑制。

第六，倡办洋务是张之洞抚晋期间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1883年5月，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内创设了洋务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并且派员赴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数种以为嚆矢”。他已开始认识到“洋务最为当务之急”，向各地分发《延访洋务人才启》，“开阁迎宾”广为召募各省洋务人才。^①这反映了一个开拓者的气魄和胆略。同时，张之洞还设立了山西机器局，“饬于省城东北隅宽僻地方购建新药局一所派员经理招雇工匠仿制洋火药以备拨发各营”。^②该局虽然工匠无多，每月仅能造火药一千余斤，但也开了山西兴办近代工业的先河。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在省城设立了桑棉局，召募苏州机匠来山西传授纺织技术。他还筹议开采铁矿，又拟试购洋铜铸钱等。此外，张之洞还着力发展交通事业，勘修了从山西榆次什贴镇到直隶获鹿土门口的全长380余里的公路。^③

从以上张之洞整顿发展经济的措施来看，每一项都具折上奏、制订章程、定出期限、责成专人办理既雷厉风行又认真细致因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初到山西时，“官积累、民积困，军积弱，库积欠”由于他刻意振作经过二年多的努力收到了“纲举目张，

《张文襄公全集》卷89第23—24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下同）四第419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8奏议8，《修治四天门韩侯岭完工竣折》。